



# 完整女人之必要



1997年間，澳洲政治學者克麗絲汀·華勒斯（Christine Wallace）為英國女性主義先驅潔玫·葛瑞爾（Germaine Greer）出了一本傳記，叫做《未馴悍婦》*Germaine Greer: Untamed Shrew*。華勒斯表示，如果在英語國度裡隨便到街上問一個40歲以上的人，要他們指出一個女性主義者，十之八九都會點名「潔玫·葛瑞爾」，或者會提到葛瑞爾1970年出版的成名作《女太監》（*The Female Eunuch*）。但華勒斯同時也發現，如果拿相同的問題去問女性主義者，那麼葛瑞爾被提名的機率卻會大幅降低，因為她們多半以為葛瑞爾的言論堪稱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反噬，從而將葛瑞爾視為「反」女性主義者，或至少是「糟糕的」女性主義者。

華勒斯坦承，她之所以研究葛瑞爾，除了基於葛瑞爾在女性解放運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之外，也因為葛瑞爾原籍澳大利亞，和她在某個層面上分享了國家認同之故。而我之所以對葛瑞爾產生高度的興趣，則首先是受到她的文學評論與雄辯風采所吸引，接著對她放浪不羈的生命閱歷和價值觀頗為矚目，後來我更發現葛瑞爾簡直稱得上動見觀瞻，幾乎連一舉手、一投足都會引發偌大的爭議，於是我終於開始深深感到好奇，這究竟是

是怎樣的女子，會在敵、友陣營同時被化為女性主義的象徵性圖騰，因著同樣的理由而備受詆毀與崇拜？

葛瑞爾出生於1939年1月29日的澳洲墨爾本（Melbourne），她相信父親具有英國血統，不過她的父親卻始終對自己的出身背景諱莫如深。葛瑞爾的童年並不幸福，曾經兩度逃家，但是仔細追究起來，我認為她的不快樂與其說是外界的影響，或許她本身過度尖銳、犀利的聰明才智和天生的叛逆性格，才是更重要的因素。

舉例來說，葛瑞爾在滿50歲那年，寫了一本有關父親的回憶錄，一位當年和她同在天主教學校上課的女朋友讀了這本書後，向擔任校長的修女表示，葛瑞爾至今仍沉溺在童年生涯的不幸當中，

著實令她難以置信，並表示願意把書借給校長過目，然而修女校長的反應卻是：「不要把書借給我。我不忍心知道潔玫竟有這麼憂鬱！我不忍心看到那個美好的女孩竟會如此悲傷！」換句話說，儘管在葛瑞爾的眼裡，從前封閉的校園生活一無是處，但昔日師友對她的評價卻是「那個美好的女孩」，可見在探索葛瑞爾的內心世界之際，或許我們有必要了解她的判斷經常是相當主觀的概念，因此在咀嚼她的觀點時，緊隨她的邏輯推理一路而下固然相當重要，但記得適時跳出她的思考框架，和外在的世界互相印證、對比，進行更全面性的觀照，毋寧亦有必要。

葛瑞爾的父親原在報社擔任廣告行銷的工作，二次大戰爆發後被徵召入伍，因此從她有記憶起，父親便不在身邊，使她極其渴望父愛，可是當



▲潔玫·葛瑞爾

英國諾丁罕大學亞洲太平洋

研究所研究員／蔡明燁



父親在戰後歸來時，卻因身心受創而變得相當冷漠、消極，從而使葛瑞爾對父親非常失望，而她對父愛的需求也因之無法獲得滿足。尤有甚者，葛瑞爾的母親在父親歸來後又生下了一兒一女，父親對弟弟寵愛有加、呵護備至，更使葛瑞爾內心的空虛與不平情緒難以調適。

此外，葛瑞爾和母親的關係也並不和諧，她認為自己的出世並非母親當時所想要的，因此心靈深處一直有種「棄嬰」情結，再加上父親遠征海外的期間，她目睹了母親和美國大兵的諸般調笑，於是當父親歸來以後，她相信母親在無形中把她視為個人私密的窺探者，對她產生了某種敵意和警戒心，不時對她加以打罵，同時父親也將她看成是對生活現狀潛伏的威脅，從不會對她出言迴護，更加深了她桀驁不馴的反抗態度。

從修會學校畢業之後，葛瑞爾領到了獎學金進入墨爾本大學，學習英國和法國文學，在這裡她終於享受到了自由和放任的滋味，以最大的熱情填補她對知識的強烈飢渴和對冒險的追求，無論在音樂、藝術和文學方面都展現了相當的造詣，同時她跳脫又具有煽動性的魅力，也使她在政治運動上成為活躍分子。

就讀修會學校的期間，葛瑞爾曾經實驗過自己的同性戀傾向，可是進入大學以後，身材頎長、性格強悍、機智過人的她卻成為男同學們熱烈追求的對象，她本人也不斷汰換性伴侶，樂此不疲，不過在多次墮胎之後，葛瑞爾的身體終於負荷不了，約莫在25歲之前即無法再受孕，而這雖然對她日後的理論產生了某種影響，卻未改變她的行為模式。大學時代的葛瑞爾曾經被強暴，也曾陸續有過一兩位同性戀人，但基本上她的性伴侶多為男性，並不斷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宣揚女人的性解放，從而一度被美國《生活》*Life*雜誌稱為「連男人都喜歡的挑逗女性主義者」。

1960年代期間，葛瑞爾遠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，隨後進入渥威克大學（University of Warwick）任教，而當她在學院裡講授有關英國文學和戲劇方面課程的同時，她也在平面媒體和電視銀幕上投身於當時的反文化及反政治運動，甚至曾跨行成為新喜劇寫手兼演員，風行一時。她自稱是無政府主義者，強調唯有摧毀現行的國家、宗教、婚姻和家庭制度，打破強加於世界各地農民文化上的西方價值觀，女人才能獲得徹底的解脫。

不過葛瑞爾之成為全英國知名的知識份子和女權運動代表人物，卻是1970年代以後的事。1968年時，在一位文學經紀人的鼓勵之下，葛瑞爾開始動筆把自己的想法有系統地紀錄下來，最後成為《女太監》一書。葛瑞爾在這本書裡指出，一般認為性行為代表了兩個個體的結合，此一觀念有如某人將手指插在你的鼻孔，然後宣稱與你結合般荒謬！同時她也一再呼籲消滅婚姻制度、道德標準、國家機制，以便達到解放女性的終極目標。這些激情的主張在讀者之間引起了很大的騷動，顛覆了傳統的兩性思維，並被熱愛者奉為經典，被痛恨者棄為糟粕，而也正因這種兩極化的大眾反應，葛瑞爾在一夕之間被看成是英國性解放風潮的舵手。不過葛瑞爾在當時曾經表示，每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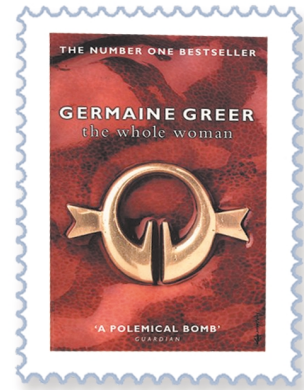
世代都應有屬於自己的女性主義宣言，《女太監》已經寫盡了她在這方面的想法，所以她不會因著本書的暢銷而一再撰寫同樣的東西，寧可本著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」的幹勁，以實際行動投入兩性革命的戰役。

孰料到了1999年時，葛瑞爾卻在慶祝60大壽之際，秉持著《女太監》無政府主義的風格及精神寫出了續集《完整女人》*The Whole Woman*，再度針對「什麼是女人？」「女人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？」等議題提出個人的見解。《完整女人》問世之後，同年4月即進入英國《書商》*Bookseller*雜誌的暢銷書排行榜，並蟬聯了冠軍寶座達數月之久，可見葛瑞爾在英國讀者心目中依舊深具號召力，然而葛瑞爾打破了30年前的自我承諾，所意味的究竟是兩性戰役的失敗？勝利？葛瑞爾個人的成長？還是自我矛盾呢？答案恐怕很是難說。

基本上，葛瑞爾發現隨著時代的快速變遷，女性的身分認同問題再度面臨了嚴重的危機，例如變性手術的合法化，迫使我們不得不深入探詢「女人」的定義，以及男女之間的根本分野。她相信所謂從小就愛蓄長髮、愛化妝、愛玩洋娃娃、害羞內向……等「特性」，並不同於「真正的女人」，因為這些性格特質，都是男性社會強加在女性身上的價值觀，因此符合了這個框架的條件，只不過是跳進了男人心目中對「女人味」定義的陷阱裡去而已！也因此到頭來，葛瑞爾認為兩性之間的最後界線，終究還是在遺傳的基因，在生理構造上的基本差異。換句話說，她認為現代社會必須突破「女人味」的層層迷思與迷障，因為「女人味」並不等於「女人」；天生有「女人味」的男人，畢竟還是男人，而天生女人者，無論有沒有所謂的「女人味」，只要忠於自我，就能追求做一個獨立、自主、完整的女人。

再者，自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，女性主義色彩濃厚的《科夢波丹》*Cosmopolitan*雜誌提出了「女人已經贏得兩性之戰，現代女性要的再也不是『抗爭』，而是『娛樂』」的訴求，招來了《女太監》批評者的冷嘲熱諷：「女性主義者憤怒地走出廚房，不過是走進了臥室！」因此葛瑞爾乃企圖藉著《完整女人》表達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」的心聲。

葛瑞爾強調，女權運動發展至今，證明了女人擁有不可忽視的力量，但現在的問題是，我們應該如何決定運用這個力量改變現狀？如何處理軍事工業的權力結構？又如何將教育下一代變成每個社會的首要之務？她相信新一代的年輕女性並未對現狀感到滿足，因為過去30年來，女人的生活雖然出現了某些變化，卻為這些改革付出了慘痛的代價！葛瑞爾舉證說，現行對墮胎的合法化，泰半被視為女性解放運動勝利的里程碑，但事實上墮胎的這件事本身，卻是對女性的肉體嚴重摧殘；又例如女人千辛萬苦爭取到工作權，但不僅在各行各業都仍面臨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，而且大多數的女人在工作之餘，仍然必須負擔家務，甚至連照顧老人、幼兒和病痛家屬的問題，



▲《完整女人》一書



也仍被理所當然地看成是女人的職責，所以兩性革命或許向前邁進了一小步，但現代女性的生活無疑依舊十分艱難！

《完整女人》所激發的辯論持續到了21世紀，在接受加拿大媒體的訪問時，葛瑞爾坦承，許多女性主義者誤將「男女平等」當成女權運動的最大訴求，殊不知「平等」只不過是最保守的目標，至多只能維持現狀，甚至以現狀套住了具有企圖心的女性，讓她們失去了持續抗爭的根據地！然而婦女解放運動真正的目標，其實是在追求最終的「解放」，要讓全球的女性都能獲得自由，擺脫一切硬加在女人身上的束縛和枷鎖。

葛瑞爾更進一步分析，過去30多年來，許多所謂「成功」的新女性確實享受到了兩性革命奮鬥的果實，從而批評女權運動者已經不再擁有值得憤怒的理由。可是在她眼裡，這些人充其量只不過是「生活型態的女性主義者」罷了！只因爲她們得以在事業上開拓屬於自己的天地，得以在家庭中和另一半平起平坐，就自以爲功德圓滿，但事實上，這些「生活型態的女性主義者」大刺刺地僱用女人替自己洗衣、煮飯、帶小孩，甚至錙銖必較地希望付給這些女性勞工越少工資越好！她們不在乎自己的服飾是來自第三世界被剝削的幼童勞力，只在乎最浮面的「自我實現」和「自我肯定」，因此葛瑞爾抨擊道，「生活型態的女性主義者」根本不了解女性主義的真諦，而她之所以寫出《完整女人》，便是爲了要扳回這種偏離正軌的「勝利主義」心態，喚醒新一代女性的改革熱情。

追循葛瑞爾的心路歷程到此，我認爲葛瑞爾的激情與尖銳，顯然是她最大的魅力，但無可諱言，也是她最大的致命傷。葛瑞爾對女性「解放」的熱切追求，不僅一再向社會禁忌的界線探底，也刺激了我們對生命的價值觀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做更深刻的反省；然而她跳躍式的思考模式，驚世駭俗的行爲舉止，以及隨興所至的主觀評斷，卻往往橫生枝節，轉移辯論的焦點，從而掩蓋了更值得深究的重要議題，例如她在書中突然指出，治療不孕症所帶來的痛苦遠超過喜悅，進而對此醫術大加譏伐，又認爲女人雖然可能比男人犯下更多傷害兒童、手足、伴侶的惡行，但這一切終歸還是男人的錯……等，自不免令人大搖其頭，或有不知所云之感。

不過我同時也不禁開始懷疑，到底有沒有不受爭議的「女性主義者」？女性主義作家費·威爾登（Fay Weldon）曾說，「共識」並非女性主義追求的目標，芭芭拉·魏斯特（Barbara West）則坦承，她從不知道什麼是「女性主義者」，只知道當自己發表了拒絕被視爲「踏腳墊」的言論時，就會被貼上「女性主義者」的標籤——可見女人難爲，做爲一名女性主義者，也是同樣令人心力交瘁！然而瞧葛瑞爾的復出，以及她在女性主義論壇上所掀起的滔天巨浪，不管論點矛盾不矛盾，弔詭不弔詭，至少在這場聲嘶力竭的廝殺中，恐怕沒人敢說「女性主義已死」吧？

15-24